



JLSLS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JLSLS, Vol. 1, No.2, 2025, pp.157-169.

Print ISSN: 3078-3755; Online ISSN: 3104-5065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sl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SLS.25.2.01>

语言规划研究的范式演进与流派分野

——基于《剑桥》《牛津》《劳特利奇》三本权威手册的比较研究

方小兵 (Fang Xiaobing)

摘要：语言规划作为应用语言学与公共政策交叉领域的核心议题，其研究范式在近十余年间经历了从“技术导向”到“批判反思”再到“政策落地”的显著转型。本文以2012年《剑桥语言政策手册》(Bernard Spolsky 主编)、2018年《牛津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James W. Tollefson & Miguel Pérez-Milans 主编)、2024年《劳特利奇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Michele Gazzola 等主编)三本权威著作的目录体系与核心内容为分析对象，通过“核心主题—研究方法—话语体系”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梳理经典语言规划学派、批评语言政策学派与公共政策导向学派的理论分野与演进逻辑。研究发现：经典学派以“领域规划”为核心，构建“实践—信念—管理”的静态分析模型；批评学派以“权利与意识形态”为锚点，揭露语言政策背后的权力不平等；公共政策学派则聚焦“政策过程与效果评估”，推动语言规划向实证化、精细化的政策科学转型。三者共同构成语言规划研究“问题识别—批判解构—解决方案”的完整逻辑链，其演进轨迹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语言问题从“技术调节”到“社会公平”再到“治理效能”的关注焦点迁移。

关键词：语言政策与规划；学术手册；研究范式；流派演进

作者简介：方小兵，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语言政策，国际中文教育，术语学。电邮：fangxb@nju.edu.cn。

Title: The Paradigm Evolution and School Differenti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ree Authoritative Handbooks

Abstract: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language planning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shifting from “technology-oriented” to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further to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catalog systems and core contents of three authoritative wor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edited by Bernard Spolsky, 2012),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edited by James W. Tollefson & Miguel Pérez-Milans, 2018), an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edited by Michele Gazzola et al., 2024). By adopt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ore themes—research methods—discourse systems”,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planning school, the critical language policy school, and the public policy-oriented schoo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lassical school centers on “domain planning” and constructs a static analytical model of “practice—belief—management”; the critical school takes “power and ideology” as its anchor to expose the power inequality behind language policies; the public policy school focuses on “policy processes and effect evaluation”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towards an empirical and refined policy science. The three schools form a complete logical chain of “problem identification—critical deconstruction—solution proposal”. Their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reflects the shift i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n language issues from “technological adjustment” to “social equity” and further 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LPP; academic handbook; research paradigm; school evolution

Author Biography: Fang Xiaobing, Ph.D.,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and serves as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 Focuses: language policy,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rminology. E-mail: fangxb@nju.edu.cn.

一、引言

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系统性研究语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学科，自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以来，始终围绕“如何通过有计划地干预调节语言行为以适配社会需求”这一核心命题展开（Spolsky, 2004）。随着全球化深入、族群权利意识觉醒与公共政策科学化浪潮的冲击，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方法体系均发生显著变化，逐渐形成多元并存的学派格局。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劳特利奇出版社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权威出版机构，分别于 2012 年、2018 年、2024 年推出由领域内领军学者主编的语言规划手册，恰好构成观察这一学科范式演进的“时间切片”。

Bernard Spolsky 主编的《剑桥语言政策手册》（以下简称《剑桥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2012），以其“经典语言规划”理论为核心，构建了涵盖语言实践、

信念与管理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代表了语言规划研究“领域导向”的传统范式；James W. Tollefson 与 Miguel Pérez-Milans 主编的《牛津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以下简称《牛津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2018），受批判社会学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将语言政策视为“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载体”，形成聚焦权利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批评学派；Michele Gazzola、François Grin 等主编的《劳特利奇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以下简称《劳特利奇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2024），则吸收公共政策研究的“过程—效果”逻辑，强调语言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全链条分析，标志着语言规划向“公共政策科学”的转型。

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手册的内容解读（如 Hornberger, 2013 对《剑桥手册》的评析；Ricento, 2019 对《牛津手册》的讨论），缺乏对三本手册的系统性对比，尤其忽略了目录体系背后反映的研究范式差异。本文通过梳理三本手册的目录结构与核心章节，从“核心主题”“研究方法”“话语体系”三个维度展开对比，旨在揭示语言规划研究的流派分野与演进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与方法启示。

二、三本权威手册的目录体系与结构对比

目录作为学术著作的“骨架”，直接反映编者的理论立场与内容取舍。本节通过梳理三本手册的章节设置、主题分布与逻辑架构，构建“宏观结构—中观主题—微观议题”的三级对比体系，为后续流派分析奠定基础。

（一）《剑桥语言政策手册》（2012）：经典学派的“领域全覆盖”结构

Spolsky 主编的《剑桥手册》共分为 5 个部分、30 章，总字数约 80 万字，涵盖语言政策的定义与原则、宏观层面政策、非政府领域政策、全球化与现代化影响、区域与主题议题五大板块，其目录结构呈现“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递进（见表 1）。

表 1 《剑桥语言政策手册》（2012）目录核心结构

（Table 1 Core Structure of the Contents 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2012)）

部分	主题	核心章节	主题占比
Part I	Definition and principles （定义与原则）	语言政策的定义、历史、哲学基础、民族主义与语言政策、族群认同与语言政策、濒危语言政策、工具主义语言观	23.33% （7/30）
Part II	Language policy at the macrolevel （宏观层面语言政策）	超国家层面政策、领土主义与区域自治、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城市层面政策、服务领域政策、美国语言政策、教育媒介语言政策	26.66% （8/30）
Part III	Non-governmental domains （非政府领域）	职场语言政策、宗教语言政策、家庭语言政策、聋人群体语言政策	13.33% （4/30）
Part IV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全球化与现代化）	跨国主义与移民、语言管理机构、读写与书写改革、语言行动主义、英语的全球角色	16.67% （5/30）
Part V	Regional and thematic issues （区域与主题议题）	国家语言复兴运动、非洲殖民与后殖民政策、美洲原住民语言规划、欧盟语言政策、前苏联地区政策、亚太地区政策	20% （6/30）

从目录可见,《剑桥手册》的核心特征是“领域全覆盖”:在空间维度上,涵盖超国家(如欧盟)、国家(如印度、以色列)、区域(如加泰罗尼亚)、城市(如东京、渥太华)、家庭(如移民家庭语言选择)等多个层级;在社会领域上,涉及教育、职场、宗教、医疗、法律等关键场景;在区域范围上,覆盖欧洲、非洲、美洲、亚太、前苏联地区等主要语言政策热点区域。这种结构反映了经典语言规划学派“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语言规划实践”的研究思路,其理论核心是 Spolsky 提出的“语言政策三成分模型”(语言实践、语言信念、语言管理),并将这一模型应用于不同空间与领域的语言现象分析。

(二)《牛津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2018):批评学派的“权利—意识形态”结构

Tollefson 与 Pérez-Milans 主编的《牛津手册》共分为 5 个部分、35 章,总字数约 100 万字,以“语言政策与权力不平等”为核心线索,构建“理论基础—社会维度—区域案例—政策干预”的批判分析框架(见表 2)。

表 2 《牛津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2018)目录核心结构
(Table 2 Core Structure of the Content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2018))

部分	主题	核心章节	主题占比
	引言	研究综述: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3% (1/35)
Part I	概念基础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历史谱系;研究方法;批判性民族志转向;批判话语—民族志视角;语言政策民族志中的元语用学;语言伦理与跨学科挑战	17% (6/35)
Part II (1)	国家与社 区维度	民族主义与国家语言;西方政治理论中的语言与国家;语言标准化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与英语的角色;语言权利与语言压制	43% (15/35)
Part II (2)		教学媒介语政策;语言测试与公民身份;语言政策与大众传媒;国际危机媒体报道中的隐性语言政策;语言政策与规划及语言景观	
Part II (3)		濒危语言复兴与维系;社会经济变迁与原住民语言政策;批判性社区语言教育政策;家庭语言政策;手语语言政策	
Part III (1)	后现代 视角	新自由主义;后民族主义与语言的商品化;语言融合;跨国公司语言政策;新自由主义与语言治理术;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不平等与阶级问题	34% (12/35)
Part III (2)		流动性、多样性与新媒体;安全议题与语言政策;语言政策与新媒体	
Part III (3)		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教育政策与社会语言学	
Part IV	结语	未来研究展望	3% (1/35)

与《剑桥手册》的“领域全覆盖”不同,《牛津手册》的目录结构呈现强烈的“批判导向”:在理论基础部分,专门设置“批判性语言政策研究”“语言意识形态”等章节,明确将语言政策视为“社会权力结构的投射”;在社会维度部分,聚焦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不平等议题,分析语言政策如何加剧或缓解这些不平等(如“语言政策与移民融入”章节揭露主流语言政策对移民群体的排斥);在争议与未来部分,直接将“社会正义”“伦理争议”作为核心议题,呼吁语言政策研究关注弱势群体权利。这种结构反映了批评学派“以权力为核心,解构语言政策背后不平等机制”的研究思路,其理论基础是 Bourdieu 的“语言资本”理论与 Foucault 的“话语权力”理论,强调语言政策并非中性的技术干预,而是“优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三)《劳特利奇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2024):公共政策派的“过程—效果”结构

Gazzola、Grin 等主编的《劳特利奇手册》共分为 7 个部分、45 章,总字数约 120 万字,吸收公共政策研究的“输入—过程—输出—反馈”逻辑,构建“理论框架—政策过程—评估方法—区域案例—跨领域议题”的实证分析体系(见表 3)。

表 3 《劳特利奇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2024)目录核心结构
(Table 3 Core Structure of the Content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2024))

部分	主题	核心章节	主题占比
Part	引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从理论到实践	2.56% (1/39)
Part I	基础概念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历史发展;语言政策与规划关键概念和术语;语言竞争模型	7.69% (3/39)
Part II (1)	语言政策 周期	语言规划的国家维度;语言和公民身份;语言规划与社会动员;语言与领土;语言、劳动力市场与贸易;语言政策经济学;认知视角对语言政策的影响	51.29% (20/39)
Part II (2)		语言的政治与议程设置;权力与语言政治;公共领域语言政策与话语:作为政策对象的语言;群体关系与语言态度对语言政策的影响	
Part II (3)		政策制定与采纳;语言政策设计;语言政策措施;语言政策的成本与收益;治理、复杂性与多层次语言政策;语言权利与国际法律工具	
Part II (4)		语言政策实施的原则;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指标	
Part II (5)		语言政策评估;语言规划中的统计测量与因果模式识别;语言政策民族志监测	
Part III	语言政策 语境	官方多语制;少数语言的保护与推广;原住民语言复兴;国际组织与超国家组织;多语言城市;《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语言教育政策功能;语言政策、读写能力与多语言;高等教育中的语言政策;公共服务与翻译政策;新旧媒体中的语言政策与规范;语言景观;手语;世界语;跨国机构语言政策;劳动市场和社会融合的语言政策	38.46% (15/39)

《劳特利奇手册》的目录结构最显著特征是“实证导向”与“政策科学化”：在政策过程部分，首次将“议程设置”“执行困境”“公众参与”等公共政策核心概念引入语言规划研究，分析语言政策从“想法”到“落地”的转化机制；在评估方法部分，系统介绍成本—收益分析、长期影响追踪等量化方法，填补了传统语言规划研究“重制定、轻评估”的空白；在跨领域议题部分，关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兴议题与语言政策的互动，体现了语言规划研究的“现实关怀”。这种结构反映了公共政策学派“以效能为核心，推动语言政策科学化”的研究思路，其理论基础是公共政策的“过程模型”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强调语言规划需兼顾“公平”与“效率”，通过实证方法优化政策设计。

（四）目录结构的整体对比

通过对三本手册目录的横向对比，可提炼出以下核心差异：

- 1.逻辑主线不同：《剑桥手册》以“空间—领域”为逻辑主线，追求语言规划场景的全覆盖；《牛津手册》以“权力—权利”为逻辑主线，聚焦语言政策的社会不平等维度；《劳特利奇手册》以“过程—效果”为逻辑主线，强调语言政策的科学化与实证化。
- 2.理论定位不同：《剑桥手册》是“理论应用型”，将“三成分模型”应用于不同场景；《牛津手册》是“理论批判型”，通过解构现有政策推动理论反思；《劳特利奇手册》是“理论整合型”，吸收公共政策、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拓展语言规划研究边界。
- 3.实践导向不同：《剑桥手册》侧重“描述性实践”，梳理不同场景的语言规划案例；《牛津手册》侧重“批判性实践”，呼吁通过政策改革实现社会正义；《劳特利奇手册》侧重“操作性实践”，提供语言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的工具方法。

三、三本手册的核心主题与流派分野

基于目录结构分析，本节进一步从“核心主题”“研究方法”“话语体系”三个维度，深入剖析经典学派、批评学派与公共政策学派的理论差异，揭示语言规划研究的流派分野。

（一）经典学派（《剑桥手册》）：以“领域规划”为核心的静态分析

Spolsky 主编的《剑桥手册》代表经典语言规划学派的巅峰，其核心主题围绕“语言政策的构成要素与领域应用”展开，形成“定义—分类—应用”的理论逻辑。

1.核心主题：语言政策的“三成分模型”与领域适配

经典学派的理论核心是 Spolsky 提出的“语言政策三成分模型”，即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社群成员实际的语言使用行为）、“语言信念”（社群成员对语言的价值判断）、“语言管理”（权威机构对语言实践的干预）三部分构成（Spolsky, 2012: 3）。这一模型将语言政策视为“静态的系统构成”，强调三者的相互作用：语言实践是政策的基础，语言信念是政策的动力，语言管理是政策的手段。

在领域应用层面，《剑桥手册》将这一模型应用于教育、家庭、职场、宗教等多个场景，形成“场景差异化分析”思路：在教育领域，关注“教学媒介语言选择”（如 Walter & Benson, 2012），分析母语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的平衡；在家庭领域，聚焦“代际语言传递”（如 Caldas,

2012），探讨移民家庭如何维持祖传语；在职场领域，研究“语言能力与职业发展”（如 Duchêne & Heller, 2012），分析多语言职场中的语言歧视。这种“领域全覆盖”的研究思路，反映了经典学派“解决具体语言问题”的务实导向。

2. 研究方法：定性主导的描述性分析

经典学派的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强调通过案例研究、田野调查、文献分析等方法梳理语言政策的实际运作：在案例选择上，注重“典型性”，如选择以色列希伯来语复兴、印度国家语言规划等经典案例（Lo Bianco, 2012）；在数据收集上，依赖“二手资料”与“深度访谈”，如分析国际电联的决议文本（de Varennes, 2012）、访谈移民家庭的语言选择（Caldas, 2012）；在分析框架上，采用“归纳法”，通过多个案例的对比提炼语言政策的共性规律。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情境敏感性”，能够捕捉不同文化、不同区域语言政策的特殊性；局限性则是“缺乏普适性”，难以形成可推广的理论模型，且较少涉及量化分析，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不足。

3. 话语体系：技术导向的“中性干预”

经典学派的话语体系呈现“技术导向”特征，将语言政策视为“中性的技术干预”，核心话语包括：“问题解决”：将语言多样性、语言濒危等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语言规划是“解决方案”（Sallabank, 2012）；“系统平衡”：强调语言政策需平衡“合法性”“效率”“成本”三者关系，如国际组织语言政策需兼顾成员国平等与运营效率（de Varennes, 2012）；“权威主导”：默认语言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学术机构等权威组织，较少关注公众参与（Spolsky, 2012）。

这种话语体系的优点是“目标清晰”，能够快速聚焦语言问题的核心；缺点是“忽视权力不平等”，将语言政策视为“技术问题”而非“社会问题”，难以解释为何某些语言政策会加剧社会排斥。

（二）批评学派（《牛津手册》）：以“权利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批判解构

Tollefson 与 Pérez-Milans 主编的《牛津手册》代表批评语言政策学派的成熟，其核心主题围绕“语言政策与权力不平等”展开，形成“解构—批判—变革”的理论逻辑。

1. 核心主题：语言政策的“权力投射”与社会正义

批评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语言政策即权力”，认为语言政策并非中性的技术干预，而是“优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Tollefson, 2018: 15）。这一观点源于 Bourdieu 的“语言资本”理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象征资本”，掌握主流语言的群体可通过政策将自身语言优势转化为社会优势。

在具体议题上，《牛津手册》聚焦三大核心：语言权利：批判“单语主义”政策对少数群体语言权利的剥夺，如美国“英语唯一”运动对西班牙语使用者的排斥（Ricento, 2018）；意识形态：揭露语言政策背后的“隐性意识形态”，如欧盟语言政策表面“多元包容”，实则强化英语的霸权地位（Heller, 2018）；社会不平等：分析语言政策如何加剧阶级、种族、性别不平等，如职场中“标准语言”要求对工人阶级、移民群体的歧视（Pérez-Milans, 2018）。

这种“以权利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反映了批评学派“推动社会正义”的价值导向，弥补了经

典学派“忽视权力维度”的缺陷。

2.研究方法：定性主导的批判性分析

批评学派的研究方法以“批判性定性研究”为主，强调通过话语分析、民族志、个案研究等方法揭露语言政策的“权力本质”：在话语分析上，聚焦政策文本的“隐性含义”，如分析政府文件中“语言统一”表述背后的“同化主义”意识形态（Wright, 2018）；在民族志研究上，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捕捉语言政策的“实践偏差”，如观察学校中“双语教育政策”如何被教师转化为“单语教学”（García, 2018）；在个案研究上，选择“边缘群体案例”，如难民、原住民、少数族裔，分析语言政策对其生活的影响（May, 2018）。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深度解构”，能够揭示语言政策的“表象与本质”差异；局限性则是“缺乏建设性”，多聚焦“问题批判”，较少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改进方案，且量化分析不足，难以验证批判观点的普适性。

3.话语体系：正义导向的“权力批判”

批评学派的话语体系呈现“正义导向”特征，核心话语包括：“语言霸权”：指主流语言通过政策获得的“不正当优势”，如英语在全球的传播并非“自然选择”，而是“帝国主义遗产”（Phillipson, 2018）；“语言权利剥夺”：指少数群体因语言政策无法使用自身语言，如原住民儿童被迫接受主流语言教育（Skutnabb-Kangas, 2018）；“社会正义”：主张语言政策需保障所有群体的语言权利，实现“语言平等”（Tollefson & Pérez-Milans, 2018）。

这种话语体系的优点是“价值鲜明”，能够唤起社会对语言不平等的关注；缺点是“理想主义”，部分政策建议（如“完全语言平等”）忽视现实条件限制，难以落地。

（三）公共政策学派（《劳特利奇手册》）：基于“政策过程与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

Gazzola 等主编的《劳特利奇手册》代表公共政策导向学派的兴起，其核心主题围绕“语言政策的科学化与效能优化”展开，形成“过程—评估—改进”的理论逻辑。

1.核心主题：语言政策的“全链条管理”与效能优化

公共政策学派的理论核心是“语言政策即公共政策”，将语言规划纳入公共政策的框架下分析，强调语言政策需遵循“议程设置—制定—执行—评估”的全链条逻辑（Gazzola et al., 2024: 23）。这一观点吸收了公共政策研究的“过程模型”（Lasswell, 1951），认为语言政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目标合理”，更取决于“过程科学”。

在具体议题上，《劳特利奇手册》聚焦三大核心：政策过程：分析语言政策的“转化机制”，如为何某些语言政策“制定易、执行难”（Grin, 2024），探讨公众参与对政策合法性的影响（Cardinal, 2024）；效果评估：建立语言政策的“评估体系”，包括短期效果（如语言使用率变化）、长期影响（如对社会融合的作用）、成本—收益（如双语教育的投入与产出）（Heugh, 2024）；新兴议题：探索语言政策与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的互动，如 AI 翻译对语言政策的冲击、气候变化导致的语言濒危与政策应对（Gazzola, 2024）。

这种“以效能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反映了公共政策学派“解决现实问题”的务实导向，弥补了经典学派“轻评估”与批评学派“轻建设”的缺陷。

2.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实证分析

公共政策学派的研究方法以“实证主义”为主，强调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实现语言政策的“科学化”：在定量分析上，引入成本—收益分析（Grin，2024）、面板数据模型（用于长期影响追踪）、实验设计（如对比不同双语教育模式的效果）；在定性分析上，采用政策工具分析（梳理语言政策的具体手段）、执行过程追踪（通过访谈、观察记录政策落地过程）；在混合方法上，结合定量数据与定性案例，如通过问卷调查量化公众对语言政策的态度，再通过深度访谈解释态度形成原因（Cardinal，2024）。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科学性与操作性”，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数据支持；局限性则是“数据依赖”，部分语言政策议题（如语言意识形态）难以量化，且对研究资源要求较高，在数据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应用受限。

3.话语体系：效能导向的“政策科学”

公共政策学派的话语体系呈现“效能导向”特征，核心话语包括：“政策过程”：指语言政策从“想法”到“落地”的全流程，强调“执行”与“制定”同等重要（Gazzola，2024）；“效果评估”：指通过实证方法衡量语言政策的目标实现程度，拒绝“凭感觉判断政策成败”（Heugh，2024）；“成本—收益”：指语言政策需平衡投入与产出，避免“高成本、低效果”的政策（Grin，2024）。

这种话语体系的优点是“务实性”，能够推动语言政策从“理念”走向“实践”；缺点是“技术主义倾向”，部分忽视语言政策的价值维度（如文化遗产），难以仅通过“成本—收益”衡量政策价值。

（四）流派分野的核心维度对比

为清晰呈现三大学派的差异，本文构建“核心维度对比表”（见表4）：

表4 三大学派核心维度对比表

(Table 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re Dimensions of the Three Major Schools)

维度	经典学派（《剑桥手册》）	批评学派（《牛津手册》）	公共政策学派（《劳特利奇手册》）
核心问题	如何通过干预调节语言行为以适配社会需求？	语言政策如何维护或挑战社会权力结构？	如何通过科学的政策过程与评估优化语言治理效能？
理论基础	Spolsky“三成分模型”、Haugen“状态—语料规划”	Bourdieu“语言资本”、Foucault“话语权力”	公共政策“过程模型”、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研究对象	不同空间、领域的语言规划实践	语言政策与社会不平等（阶级、种族、性别）	语言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全链条
研究方法	定性描述（案例研究、田野调查）	批判性定性研究（话语分析、民族志）	定量与定性结合（成本—收益分析、过程追踪）
价值导向	技术中性、系统平衡	社会正义、权利平等	治理效能、政策科学
政策建议	适配场景的差异化干预	改革权力结构、保障少数群体权利	优化政策过程、建立评估体系
局限性	忽视权力不平等、轻评估	缺乏建设性、理想主义	数据依赖、技术主义倾向

四、三本手册的学术价值与局限点评

作为语言规划领域的权威著作，三本手册各有其学术贡献与局限性，本节从“理论价值”“方法价值”“实践价值”三个维度对其进行点评，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剑桥语言政策手册》（2012）：经典理论的“集大成者”

1. 学术价值

一是理论整合价值。经典语言规划理论首次得到整合，Spolsky 的“三成分模型”、Haugen 的“地位—本体规划”、Fishman 的“语言转用理论”等核心概念纳入同一框架，形成“定义—分类—应用”的完整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地图”。

二是案例积累价值。涵盖全球五大洲、多个社会领域的语言规划案例，如以色列希伯来语复兴、欧盟多语言政策、美洲原住民语言保护等，这些案例成为后续研究的“经典参照”，尤其为区域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三是学科奠基价值。明确语言政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融合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视角，推动语言规划从“语言学分支”发展为“独立交叉学科”，其目录结构成为后续语言政策手册的“范本”。

2. 局限性

首先是理论呈现静态性。将语言政策视为“实践—信念—管理”的静态系统，忽视语言政策的动态演进与权力维度，难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政策的“意识形态冲突”，如英语全球化与本土语言保护的矛盾。

方法上的单一性是另一突出问题。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量化分析与实证评估，政策建议多基于“经验判断”而非“数据支持”，如主张“濒危语言保护”，但未提出具体的保护成本与效果衡量标准。

同时，时代局限性也较为明显。未关注 2010 年后的新兴议题，如数字时代的语言政策（社交媒体语言管理）、人工智能对语言规划的影响，其案例多集中于 2000 年前的语言规划实践，对近年来的语言政策新现象（如“英语作为通用语”）覆盖不足。

（二）《牛津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2018）：批判视角的“开拓者”

1. 学术价值

一是理论创新价值。手册将批判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引入语言规划研究，提出“语言政策即权力”的核心观点，打破经典学派“技术中性”的迷思，推动语言政策研究从“问题解决”转向“社会批判”，拓展了学科的理论边界。

二是价值重构价值。手册将“社会正义”“语言权利”纳入语言政策研究的核心议程，关注难民、原住民、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的语言困境，推动语言规划研究从“技术导向”转向“价值导向”，提升了学科的社会关怀。

三是方法拓展价值。手册发展“批判性话语分析”“民族志研究”等定性方法，用于解构语言政策的“隐性意识形态”，如分析政府文件中“语言统一”表述背后的同化主义，为后续批判语言政策研究提供方法参照。

2. 局限性

首要问题是建设性不足。它过度聚焦“问题批判”，如揭露语言政策的权力不平等、社会排

斥，却较少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改进方案，导致部分研究“只有批判，没有建设”，难以指导实际语言政策实践。

理想主义倾向是另一明显缺陷。主张“完全语言平等”“废除语言霸权”，忽视现实条件限制（如成本、效率、社会接受度），如建议“所有少数语言均应获得官方地位”，但未考虑小语种地区的经济承载力。

区域失衡也影响了手册的全球适用性。案例多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语唯一”运动、欧盟语言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政策批判不足，如非洲、亚洲的后殖民语言政策问题覆盖较少，难以反映全球语言政策的多样性。

（三）《劳特利奇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2024）：公共政策视角的“整合者”

1. 学术价值

首先是理论整合价值。手册首次将公共政策、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引入语言规划研究，构建“政策过程—效果评估”的实证分析框架，推动语言规划从“人文社科分支”向“政策科学”转型，填补了经典学派与批评学派的“实践空白”。

方法创新是手册的另一重要贡献。手册系统介绍语言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长期影响追踪、混合方法研究等实证方法，提供具体的评估工具与操作步骤（如语言政策评估的指标体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操作的方法工具”，推动语言政策研究的“科学化”。

时代前沿性是手册区别于前两部著作的显著特征。手册关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新兴议题与语言政策的互动，如分析 AI 翻译对语言政策的冲击、疫情期间的多语言公共卫生信息传播，覆盖了近年来的语言政策新现象，其案例多为 2010 年后的实践，时代针对性强。

2. 局限性

首先是对数据的过度依赖，它以定量数据与实证方法为核心研究手段，却对难以量化的语言政策议题关注不足，如语言意识形态的演变、语言背后的文化传承价值等，均未得到充分探讨。此外，实证方法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在数据收集难度大、数据质量难以保障的发展中国家，如部分非洲国家，其方法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

其次是技术主义倾向明显。手册将语言政策视为“可优化的技术系统”，部分忽视语言政策的价值维度与文化意义，如通过“成本—收益”衡量濒危语言保护政策，可能低估语言的文化遗产价值。

最后是理论深度有待提升。对公共政策理论的吸收多停留在“应用层面”，如引入“政策过程”概念，但未深入探讨其与语言政策特殊性的结合，如语言政策的“文化属性”如何影响政策执行，理论整合的深度有待提升。

五、本研究的价值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将《剑桥语言政策手册》《牛津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劳特利奇语言政策与规划手册》置于同一研究视野，通过对它们细致入微地对比分析，梳理出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脉络。从经典学派到批评学派，再到公共政策学派，每个学派都有其独特的理论内核、研究路径与话语体系，这些内容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语言规划研究流派图谱”，为后续研究搭建起理论基石，帮助学界明晰研究定位与发展方向。

以往研究多局限于对手册的单独解读，而本研究另辟蹊径，将这三本手册当作不同时期语言规划研究范式的生动缩影。通过比对目录、剖析内容，我挖掘出学科内的流派分化与演进规律，摒弃孤立评判手册价值的做法，以动态视角展现学科发展全貌。同时，文章构建的“核心主题—研究方法—话语体系”三维对比框架，不仅关注手册内容差异，更深入探究各学派理论根源与话语特色，避免了流于表面的对比。

此外，本文还提出“语言规划研究逻辑链”这一观点。经典学派聚焦问题识别，批评学派侧重批判解构，公共政策学派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闭环。这一演进过程映射出全球化浪潮下，语言问题关注点从技术层面调节，逐步转向社会公平，再到治理效能的转变。经典学派围绕“领域规划”，构建静态分析模型；批评学派以“权利与意识形态”为切入点，推动研究价值转向；公共政策学派引入科学评估方法，促进研究实证化。它们并非相互取代，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语言规划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语言规划研究将呈现三大方向：

第一，理论整合化。经典学派的“领域分析”、批评学派的“权力视角”、公共政策学派的“实证方法”将进一步整合，形成“兼顾技术、价值与效能”的综合理论框架，如将“语言权利”纳入公共政策的“公平—效率”分析中，实现“价值导向”与“科学导向”的平衡。

第二，方法混合化。定量与定性方法将进一步结合，如通过定量数据衡量语言政策的效果，再通过定性研究解释效果形成的原因，避免“单一方法”的局限，推动语言政策研究的“方法多元化”。

第三，议题前沿化。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数字全球化等新兴议题将成为语言规划研究的核心，如 AI 翻译对语言政策的冲击、数字平台的语言管理、气候变化导致的语言濒危与政策应对，这些议题将推动语言规划研究与现实社会的深度互动，提升学科的现实价值。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Fang Xiaob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4113-4810>

Reference

- Caldas, S. J. (2012). "Language Policy in the Family."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pp. 351-3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 Varennes, F. (2012). "Language Policy at the Supranational Level."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pp. 149-1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chêne, A., & Heller, M. (2012). "Language Policy in the Workplace."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pp. 323-33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zzola, M. (2024). "Evalu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M. Gazzola, F. Grin, & B.-A. Wickström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76-89). Routledge.
- Gazzola, M., et al. (2024).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New York: Routledge.
- Gazzola, M., Grin, F., & Wickström, B.-A. (2024). Introduction. In M. Gazzola, F. Grin, & B.-A. Wickström (Eds.), *The*

-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1-14). Routledge.
- Grin, F. (2024). "Economics and Language Policy." In M. Gazzola, F. Grin, & B.-A. Wickström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33-46). Routledge.
- Heller, M. (2018). "Language,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ty." In J. W. Tollefson & M. Pérez-Mila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243-26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nberger, N. H. (2013). "Review of the Book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by B. Spolsky (Ed.)." *Language Policy* (02): 191-194.
- Hornberger, N. H. (2018).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nglish-as-a-Lingua-Franca." In J. W. Tollefson & M. Pérez-Mila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39-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 Bianco, J. (2012). "National Language Revival Movements: Reflections From India, Israel, Indonesia and Ireland."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pp. 501-5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ento, T. (2018). "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J. W. Tollefson & M. Pérez-Mila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17-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ento, T. (2019). "Review of the Book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by J. W. Tollefson & M. Pérez-Milans (Eds.)." *Language Policy* (04): 629-632.
- Ricento, T. (2024). "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M. Gazzola, F. Grin, & B.-A. Wickström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168-182). Routledge.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 (2012).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 (2012). "What Is Language Policy?"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pp. 3-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llefson, J. W. & Pérez-Milans, M. (2018).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llefson, J. W. (2018). "The Role of English in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J. W. Tollefson & M. Pérez-Mila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437-45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llefson, J. W. (2024). "Language Policy and Inequality." In M. Gazzola, F. Grin, & B.-A. Wickström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183-198). Routledge.
- Tollefson, J. W., & Pérez-Milans, M. (2018).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J. W. Tollefson & M. Pérez-Mila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pp. 1-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ter, S. L., & Benson, C. (2012). "Language Policy and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Formal Education."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pp. 278-3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